

略论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

张 大 可

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叙扬州人物之盛云：“丹阳旧京所在，人物本盛，小人率多商贩，君子资于官禄，市廛列肆，埒于二京。……宣城、毗陵、吴郡、会稽、余杭、东阳数郡川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凑。其人君子尚礼，庸庶敦庞，故风俗澄清，而道教隆洽，亦其风气所尚也。”又云：“南海、交趾，各一都会也，并所处近海，多犀象珊瑚珠玑，奇异珍玮，故商贾至者，多取富焉。”唐代江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，中唐以后江南经济更是唐王朝的命脉。隋代是一个短暂的王朝。显然，南北朝时期，宋齐梁陈各代由于政治重心在江南，因此对于江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。而在统一王朝的两汉之后开启在江南立国的却是孙吴政权。两汉及先秦的楚国对江南的开发作出了贡献，但开发江南而出现较大的飞跃的发展，不能不归功于孙吴政权。

一、两汉对江南的开发是孙吴立国的基础

统一的西汉王朝在先秦吴楚立国的基础上，对江南有了进一步的开发，使之成为一个有发达都会的经济大区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有生动的描绘。司马迁将统一的西汉王朝全国经济发展态势分为四大区：江淮以南谓之江南；江淮以北分为山东、山西两大区，中以华山为界；龙门、碣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。在每一个大区下又分为若干小的经济区。山西区分为关中区、巴蜀区和陇西区。山东区分为三河区、燕赵区、齐鲁区、梁宋

区。江南区分为东楚区、西楚区、南楚区、岭南区。北方区基本上以畜牧为主，比较单一，未分小区。各区之下的经济中心是都市。司马迁列举了十八个经济中心的城市：长安、洛阳、巴、蜀、杨、平阳、温、软、邯郸、燕、临淄、陶、睢阳、江陵、寿春、合肥、吴、番禺。全国十二个经济小区，江南有四；全国十八个经济都市，江南有五。从数量上，江南经济，占全国1/3，当然实际上江南经济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。广大的岭南及浙闽越人聚居地还很少开发。汉武帝移越人于江淮间，说明整个江南还是地广人稀。

江南经济落后，《货殖列传》亦有生动的描述：“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稀，饭稻羹鱼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隋蠃蛤，不待贾而足，地势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以故翳窳偷生，无积聚而多贫。是故江、淮以南，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”古代社会，农业是经济的命脉，由于江南地广人稀，火耕水耨，所以经济落后，不足以对抗统一的经济发达的北方。项羽垓下失败后就自刎乌江，刘邦几乎是不战而下江南，长沙王吴芮“和平”归服中央。东汉时，安徽庐江一带，还没有推广牛耕，由太守王景教以犁耕之法，从此“垦辟倍多，境内丰给”①。王景还在庐江兴水利，整治芍陂，灌田万顷，又推广蚕织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。会稽太守马臻在镜湖也大兴水利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十六引《会稽记》说：“镜湖在会

稽、山阴两县界，筑塘蓄水，水高丈余，田又高海丈余，若少水，则泄湖灌田，如水多，则闭湖，洩田中水入海，所以无凶年，堤塘周围三百一十里，都溉田九千余顷②。”卫飒、茨充相继为桂阳太守，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。卫飒动员民众开山通道五百余里，又在来阳设置铁官，“岁所增入五百余万”；茨充教民“殖桑柘麻紵之属，劝令养蚕织屨，民得利益焉。”任延任九真太守，铸作田器，推广牛耕，“田畴岁岁开广，百姓充给”③。中国南方经济的发展，东汉一代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，为孙吴立国江南奠定了经济基础。就拿人口一项来说，荆扬两州的人口，由西汉的六百七十九万余，增至一千零五十三万余。

但是，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来看，江南仍是薄弱的地区，开发地区只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。江南半数以上的人口是山越和蛮夷，他们多数居住深山，还保持着氏族制的落后习俗，易动难安。长沙、零陵、武陵等地蛮夷在桓帝时就曾卷起了很大的骚动，攻城杀长吏，聚众以万计④。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大战乱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，同时大量北人南移加强了南方，孙权是不能在江南立国的。学术界用经济均衡的观点来解释三国鼎立是历史的必然，这种经济机械论固属简单化，但南北经济均衡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它是导致三国鼎立多因素中的物质因素。经济是基础。北方地大人多，经济恢复比南方要快，曹魏逐渐占了优势而兵强马壮，同时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，先蜀后吴，统一了南方，经济优势最终起了主要作用。但北方随后又遭五胡乱华的大破坏，南方经过孙吴的开发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，在动乱的南北朝时期，南方经济一度超过北方，如刘宋元嘉时期就是如此。当时南朝被目为正统所在，不仅仅是南方为汉人政权，而且经济文化占有优势。从宏观的历史

发展来看，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为东晋及南朝在南方立国奠定了物质基础。至于孙吴经营台湾，那就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二、北人南移和越汉、蛮汉人民的融合

东汉末，中原大乱，荆扬二州相对安定，北人南移，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与耕作技术，这是江南经济得以飞跃发展的先决条件。南下的北方人口都是质量较高的一部分，这是战乱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。愚钝无能的人大多在就地待死，只有远见卓识之士而又富于冒险的人才能远徙。董卓入京，颍川名士荀彧不愿为京官，求出补吏，拜亢父县令。荀彧弃官归乡，对父老说：“颍川，四战之地也，天下有变，常为兵冲，宜亟去之，无久留⑤。结果，乡人多怀土重迁，没有人跟随荀彧出走，后来被董卓将李傕兵临颍川时所杀略。荀彧率宗人北依冀州袁绍，后投曹操。但更多的人是南走渡江。临淮鲁肃南下时对宗亲父老说：“中国失纲，寇贼横暴，淮、泗间非遗种之地，吾闻江东沃野万里，民富兵强，可以避害，宁肯相随俱至乐土，以观时变乎⑥？”江南地广人稀，物产丰富，被中原士大夫视为避乱待时的“乐土”。当然，北人大规模的南迁是形势所迫，本身是一场灾难，大量人口在移动中死亡。依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北人南移，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：

其一，士大夫举宗避难南迁。前举鲁肃南渡是其例。琅邪诸葛瑾、诸葛亮兄弟、彭城张昭、汝南吕范等都是避难南渡，后为吴蜀大臣的。士大夫南迁，不仅举宗而走，往往带动许多人依附。如汝南名士王儁，“避地居武陵，归儁者一百余家”⑦。鲁肃南渡，率其所从三百余人。汝南名士许静率宗亲南渡依会稽太守王朗，后辗转到了交趾。孙吴桂阳太守全琮召士，“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，依琮居者以百数”⑧全琮在偏远的桂阳

一人就纳避接难的中原士大夫以百数，可见数量之大。刘表坐镇荆州时，保境安民，兴学校，讲儒术，“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”^⑨，于是在汉末形成了一个以蔡母、宋忠、司马徽等人为首的荆州学派。士大夫南迁，意味着中原学术南下，这对于江南的开发有深远影响。

其二，逐鹿中原失败的军阀南下，带有大量部曲和裹胁的男女人口。献帝兴平二年（公元195年），曹操征陶谦，徐州不宁，陶谦部将笮融裹胁军民男女万余口南渡豫章，后被扬州刺史刘繇所灭^⑩。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凉州军阀董卓残部张济、张繇、叔侄率众自关中走南阳，依附刘表^⑪。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，刘备退出中原逐鹿，率残部南依刘表，屯驻新野。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曹操南下，刘备南走江陵，荆楚群士及人民从之如云，“比到当阳，众十余万”。赤壁战后，刘备占有荆州江南四郡，“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”^⑫。

其三，流民南下。这是底层劳动人民大量的南迁，无法计数。史载关中之民“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”^⑬，即达四、五十万口。

其四，战争虏掠。建安四年（公元199年），孙策破皖，虏掠袁术残部“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”，又收得刘勋“兵二千余人”^⑭。次年，孙权讨庐江太守李术，再破皖城，“梟术首，徙其部曲三万余人”^⑮。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孙权西征黄祖，虏江夏“男女数万口”^⑯。建安十九年（公元214年）孙权进兵淮南，破皖成，“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，男女数万口”^⑰。孙权嘉禾五年（公元236年），陆逊遣将击曹魏江夏石阳，“斩首获生，凡千余人”^⑱。次年，诸葛亮“轻兵袭舒，掩得其民而还”^⑲。

其五，曹魏民逃避政苛刑酷南渡，以及

叛将南投。主要有两次。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，淮南民反对内迁，庐江、九江、蕲春、广陵等郡“户十余万皆东渡江，江西遂虚，合肥以南惟有皖城”^⑳。十余万户则有四、五十万口。孙吴五凤二年（公元255年），魏淮南镇将毋丘俭、文钦起兵反司马师，兵败，文钦降吴，“淮南余众数万口来奔”^㉑。

上列北人南移的五种类型十七项，有数字记载的十项，累计数一百四、五十万口，这仅仅是一部分，十分惊人。南下的人口，有战士，有农民，有百工技艺之人，有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，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大迁移。孙吴政权对江南经济的开发，南下的北人是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，他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江南土著居民过半数是山越和蛮夷。山越主要分布在扬州各郡，荆州西部有武陵蛮，交州有南越。山越和蛮夷以血缘关系结成大大小小的宗部林立于江南各地的山区，与逃亡的宿恶民纠合在一起，在曹操派遣的间谍煽动下对抗孙吴政权，成为心腹大患。孙权采取全面的军事镇压，强迫山越和蛮夷下山，“强者为兵，羸者补户”孙吴兵半数是山越人，孙吴的屯田和编户民山越人当有相当比重。孙吴对山越和蛮夷的镇抚政策，实质是强制同化政策，这也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强行组织越蛮之民进行兼并战争。客观上加速了越汉与蛮汉人民的融合。山越和蛮夷对于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以上两个方面，北人南移与越汉、蛮汉人民的融合，可以说是三国鼎立的对峙战争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开发，它通过孙吴政权的组织而实现。

三、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

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，分述于下。

（一）统治阶级重视农业，诸将领兵，

且耕且战。孙皓时丞相陆凯上疏说：“先帝战士，不给他役，春惟知农，秋惟收稻，江诸有事，责其死效”^②。由此可知，孙吴诸将领兵，且耕且战。孙权黄武五年（公元226年），陆逊上疏，欲令诸将增广农田，孙权报曰：“甚善”。孙权在报令中表示带头耕种，以示劝励，曰：“今孤父子亲自受田，车中八牛以为四耦，虽未及古人，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”^③。”孙吴将领世袭领兵，实行复客制、奉邑制，与且耕且战是密切联系的。国家给将领授兵，同时也授给土地、复客或奉邑，将领负责所领部曲的装备及生活。史载朱桓“部曲万口，妻子尽识之。爱养吏士，贍护六亲，俸禄产业，皆与共分。及桓疾困，举营忧戚”^④。这是将领爱护部曲的例子。所谓共分俸禄产业，实质就是奖率全军耕作屯垦，生产自给。

（二）扩大垦辟面积，兴修水利，提高产量。

江南地广民稀，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。孙权组织南下的北人和强征的山越人，进行大规模的军屯、民屯垦辟土地，扩大耕地面积。孙权赤乌年间，新都都尉陈表、吴郡都尉顾承，“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，男女各数万口”^⑤。这是大规模的垦辟。陆逊黄武五年上疏，也就是要孙权敕令诸将扩大垦田。

孙吴十分重视水利建设，将运输与灌溉两种功效结合起来。孙权开凿了从建业至钱塘的运道，灌溉两岸，土地肥沃。清阮元赞叹说：“今吴江、石门、仁和（今杭州）数百里内，皆为沃土，惟一线清流，自北新关通漕达于吴江。”^⑥吴兴西湖水利溉田三万顷^⑦，张昭所建娄湖（在今江苏昆山县）周围七里，溉田数十顷^⑧。孙权赤乌年间在建业城东开直渎，源出方山，东北流经直渎山，北入长江^⑨。又在湖北引长江支流巴水、富水以溉田^⑩。孙休永安三年（公元260

年）修浦里塘保护丹阳湖田^⑪。有的水利直接用于军事目的，如孙权和诸葛恪所筑东兴堤遏巢湖以利水师；陆抗在江陵作大堰遏水以阻止晋军侵边等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引《禹贡》说，在先秦时，扬州田下下，荆州田下中，兖州田中下，豫州中上，即荆扬田比起兖豫田要差三、四个等级。经过孙吴的开发已将差距拉平。西晋束皙在《上广农疏》中就将荆扬与兖豫等列，称“荆、扬、兖豫、汙泥之土，渠塉之宜，必多此类，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”^⑫。西汉时，“百亩之收，不过百石”^⑬，东汉时大抵亩收三斛^⑭，孙吴时江南水乡已亩产四、五斛。如钟离牧在会稽永兴垦田二十余亩，产稻得米六十斛，以稻谷得米七成计，合计稻谷九十余斛，平均亩产四斛半^⑮。

（三）屯田。大规模屯田是孙吴解决军粮和城市民粮的支柱。记载孙吴屯田的最早资料，见于《陆逊传》，说陆逊年二十一，“出为海昌屯田都尉，并领县事”。以此推导，其时在建安八年，即公元203年。孙吴的实际屯田时间当比这更早。孙吴也设置了屯田的管理机构和农官，以典农校尉、典农都尉管理军屯，督农校尉、屯田都尉掌管民屯。孙吴屯田以军屯为主。屯田地区，最初限于江东一隅，伴随孙吴政权统治区的扩大，屯田事业逐步扩大到长江中下游一带。长江是吴国抗拒曹魏的天堑。孙吴沿千里江防设置许多屯田点，保卫冲要，强兵足食。规模最大的军屯在江北庐江郡的皖城（今安徽安庆市）地区，孙吴名将诸葛恪曾“自领万人”实行屯耕^⑯。孙皓天纪二年（公元278年）十月晋军破皖城，“焚其积谷百人十余万斛，践稻田四千余顷，毁船六百余艘”^⑰，可见规模之大。民屯主要分布在新建的郡县和落后地区，安置北来流民和强掠补户的山越人。孙吴政权养有很大一支手工业工人，

特别是造船业以维持强大的水军和商船队，这些百工市民的用粮很大一部分当来自民屯。州郡编户民的租赋，大部割给了州郡将领为军食，国家仓储征自民租的部分不会太多。因此，屯田既是孙吴政权的经济支柱之一，也是开发江南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。

三国屯田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，它强使劳动人民农奴化，从阶级观点来看可以说是历史的一种倒退，它直接影响着魏晋以后封建人身依附的加强。孙吴屯田又与其特殊的领兵制度相结合，促进了大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。一个屯田点，就是一个大地主田庄，诸将领兵，名为国有实为私属。《抱朴子·吴失篇》就有着生动的描写：“势利倾于邦君，储积富乎公室，僮仆成军，闭门为市，牛羊掩原隰，田池布千里，……金玉满堂，伎妾溢房，商贩千艘，腐谷万庾，园囿凝上林，馆第僭太极，梁肉余于犬马，积珍陷于帑藏。”但是，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，孙吴屯田比曹魏屯田起了更积极的作用。这是因为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。江南山越蛮夷过半数，经济落后，孙吴屯田所推进的大土地私有制进程，在这样一个落后经济区该说是进步的。其次，孙吴以军屯为主，曹魏以民屯为主，这也是孙吴屯田比曹魏屯田进步的地方。

（四）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。冶铁、烧瓷和造船是孙吴的三大官营手工业，主要是满足军需。《水经注·江水注》记载，“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浦，从此至武昌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。”武昌地区是孙吴的冶铸业中心，主要生产兵器支援长江上流的军事重镇江陵的军需。陶弘景《刀剑录》记载，孙权黄武四年（公元225年），“采武昌山钢铁，作千口剑万口刀，各长三尺九寸，刀头方，皆是南钢越炭作之。”由此可见生产规模之大，技术之精。

江南的会稽、丹阳、豫章等郡都产铜铁，所在均设置“冶令”，负责生产。建康的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。孙亮在宫中以金银作“小船三百余艘”^{③⑧}，孙皓“使尚方以金银作华燧、步摇、假髻以千数”^{③⑨}。

孙吴制瓷业的中心在浙江地区。孙吴瓷器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有显著提高，瓷器的胎质、釉色、纹饰以及烧制技术都臻于完善，尤其是青瓷制造技术更为成熟。五十年代在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出土的青瓷虎子，上有“赤乌十四年上虞师袁作口”的铭文，可见制瓷工业有专门的技工队伍，制作认真，才在瓷器上刻下匠师名字。近年江苏镇江孙吴墓、浙江衢州市孙吴墓出土了近百件精美青瓷器，为我们研究孙吴的制瓷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料。

孙吴的造船业中心在建安郡侯官（今福建闽侯县）、临海郡永宁县（今浙江温州市）、横奠船屯（今浙江平阳县）、南海郡番禺县（今广州市）等港口。孙吴设置典船都尉，专门管理工厂船场。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，其次为商船，数量多，船体大，质量高。最大的战船可载三千士兵。有上下五层，雕镂彩画，非常壮丽，载马八十匹的海船称为小船。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，“大者长二十余丈，高去水三、二丈，望之如阁道，载六、七百人，物出万斛”^{④⑩}。孙吴武装船队一百余艘出海，随行将士一万余人，北上辽东、高句骊（今朝鲜），南下夷州（今台湾），这说明孙吴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都是很发达的。孙吴灭亡时有舟船五千余艘。

此外，孙吴的铜镜业、丝织业、制盐业，也都十分发达，不赘述。

孙吴发达的手工业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技艺工人。当时的战争提供了条件。一是南迁的百工之民，二是战争虏掠。公元199年，孙策破皖城就虏掠了袁术的部曲、鼓吹

及百工之人三万余口。孙吴后期主要靠征发。孙休永安六年（公元263年）一次就征发交趾手工千余人送建业，从而激起了一次兵民的反抗^{④1}。至于造船业则使用大量的谪刑徒^{④2}。由此可见，孙吴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是用高压政策来维持的。

（五）兴建城市交通。孙吴政权初起时在吴（今江苏苏州市），赤壁战后迁都京口（今江苏镇江市），筑京城。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年），孙权又迁都秣陵（今南京市），建石头城，改名建业。公元221年，孙权为夺取荆州，自建业徙都鄂，改名武昌（今湖北鄂州市）。从此，吴县、京口、建业、武昌城成为孙吴的四大重要城市。孙权固有荆州后，又于黄龙元年（公元229年）还都建业。孙吴修建的水陆交通以建业为中心向江南展开。上文水利建设中提到的从建业至钱塘的运道，就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身。孙权赤乌八年（公元245年）凿破冈渚，使用屯田士及作士（工程兵）三万人凿句容中道，“自小其（今江苏江宁县境内）至云阳（今江苏丹阳县）西城，通会市，作邸阁”^{④3}。这条水道用以通吴会船舰，以避大江之险。又“凿城西开沟入秦淮，通吴越运船”^{④4}。

（六）大力发展商业。江南水运便利孙吴造船业又发达，所以孙吴以水运为主，商业十分活跃。吕蒙偷袭荆州就用商船队伪装，可见吴蜀两国的水上贸易规模很大。史载，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，孙权“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，及令王惇市马”^{④5}。蜀汉建兴元年（公元223年），蜀邓芝使吴，“致马二百匹，锦千端，及方物”；吴“亦致方土所出，以答其厚意焉”^{④6}。吴魏也有大宗交易。孙权嘉禾四年（公元235年），“魏使以马来易珠玕、翡翠、瑇瑁，权曰：此皆孤所不用，而可得马，何苦而不听其交易”^{④7}。武昌是三国的贸易中心。孙权用江南方物及南海贸易之物交易吴蜀两国之马，用以补吴

之所乏。马是重要的军事物资。孙吴最发达的商业中心是以都城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。建业城内有建业大市、建业东市、建业北市。孙吴的海外贸易以交、广二州为基地与古代南海林邑、扶南等数十百国交通。吴臣朱应和康泰曾率船队出使林邑、扶南等国，两人回吴后述其所闻，朱应撰《扶南异物志》，康泰撰《吴时外国传》。这些著作是古代中国人观察海外世界最早的著述。

四、孙吴时期的江南文化

北方士人的大量南迁，传统儒学在孙吴时期的江南迅速发展起来。彭城人张昭，少好学，善隶书，博览群书，与赵昱、王朗齐名。彭城人严畯，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三礼》及《说文》，与琅邪诸葛瑾、临淮步骘齐名。汝南人程秉，郑玄弟子，博通五经。沛郡人薛综，从刘熙学，学识规纳，为吴良臣。汝南人胡综，博有文采。平原人刘惇，著名天文学家，著书百余篇。河南人赵达，善长算学。南方士人，会稽虞翻、广陵张纮、吴郡韦曜（即韦昭）、华覆、会稽贺循都是大学者。丹杨唐固、吴郡陆逊、会稽闾泽也都是饱学之士。这些众多的南北士人，大都是在孙吴中央枢要任职，有若群星灿烂，表明了孙吴政权十分重视知识文化，比较重用知识分子，在三国中推为第一。文人受重用，对于推动江南文化的高涨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孙吴政权十分重视教育，培养人才。孙休永安元年（公元258年）诏称：“古者建国，教学为先，所以道世治性，为时养器也。……。其案古置学官，立五经博士，核取应选，加其宠禄，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，各令就业。一岁课试，差其品第，加以位赏。使见之者乐其荣，闻之者羨其誉。以敦王化，以隆风俗”^{④8}。这时吴国已在走下坡路，而对教育仍如此重视，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是少有的。在孙吴政权

的大力提倡下，吴国的官学、私学都很发达。

孙吴学士著述如林，不例举，最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历法。除刘惔赵达外，陆绩、王蕃、阚泽都是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。史称陆绩“博学多识，星历算数无不该览”^⑨，著有《浑天仪说》，分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，一百七万一千里。王蕃著有《浑天象说》，纠正陆绩在理论上的错误^⑩，阚泽著《乾象历注》以正时用^⑪。孙吴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《乾象历》。

孙吴时期，江南文化的发展超过了北方，不仅缩短了南北差距，而且为尔后南朝学术的发展超过北方奠定了基础。

①《后汉书·循吏王景传》。

②马臻创设境湖灌溉，又见《通典》卷2《水利田》。

③卫飒、蒯充、任延事迹见《后汉书·循吏传》各本

传。

④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。

⑤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。

⑥《三国志·鲁肃传》裴注引《吴书》。

⑦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注引皇甫谧《逸士传》。

⑧《三国志·全琮传》。

⑨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。

⑩《后汉书·陶谦传》。

⑪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及《张繡传》。

⑫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。

⑬《三国志·卫觳传》。

⑭《三国志·孙策传》裴注引《江表传》。

⑮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裴注引《江表传》。

⑯⑰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。

⑱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。

⑲《三国志·诸葛恪传》。

⑳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。

㉑《三国志·三嗣主孙亮传》。

㉒《三国志·陆凯传》。

㉓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。

㉔《三国志·朱桓传》。

㉕《三国志·诸葛瑾传》裴注引《吴书》。

㉖阮元：《诂经精舍文集》卷10《浙江即岷江非浙江

考》，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1837册。
②《太平寰宇记》卷34《江南东道》。
③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26《江南道》。
④《嘉庆江宁府志·山水》。
⑤《水经注·江水注》。
⑥《三国志·孙休传》及《濮阳兴传》。
⑦《晋书·束皙传》。
⑧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。
⑨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引《昌言·损益篇》。
⑩《三国志·钟离牧传》。
⑪《三国志·诸葛恪传》。
⑫《资治通鉴》卷80。
⑬《三国志·孙琳传》。
⑭《三国志·孙和何姬传》裴注引《江表传》。
⑮《太平御览》卷269。
⑯《三国志·三嗣主孙休传》。
⑰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。
⑱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。
⑲《三国志会要》卷7引《健康实录》。
⑳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。
㉑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裴注引《吴历》。
㉒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。
㉓《三国志·三嗣主孙休传》。
㉔《三国志·陆绩传》。
㉕《全三国文》卷72。
㉖《三国·阚泽传》。

（作者单位：兰州大学历史系）